

捧读新民晚报“星期天夜光杯”封面人物《陈平原:阅窗外事,读圣贤书》一文后,勾起了我对往事的追忆。因撰写《报人赵超构》,多年来我与陈老师的爱人夏晓虹教授有过联系。她给予我很大的帮助,让我从中发现她的父亲与新民报的历史渊源,还有跟老社长赵超构的深厚情谊。

刘岚山的新民缘

富晓春

夏教授随母亲姓,她的父亲姓刘,名岚山,是一位从安徽和县鸡笼山下走出来的诗人。刘岚山与赵超构结识于重庆新民报时期。他进新民报是《华中日报》一位副刊编辑介绍的,最初干的是校对工。那时,他们都是热血青年,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外文学名著,想方设法接触进步书刊。不管谁的手头,有了一本好书,他们会轮流着看,当年的几本《译文》旧杂志,还有涅克拉索夫的作品,都是他们竞相抢阅的床头书。

赵超构很快发现,刘岚山的心思不在办报,他的兴趣在搞出版、出丛书、办诗刊。果然不出所料,一年多以后,刘岚山就离开新民报,自立门户,在重庆涪陵办起了“山野书店”。赵超构偶尔会到刘

岚山的书店逛逛,随便翻翻新到的书。兴致所至,他们还会在店里摆上小方桌,抿上几口老酒,侃大山。刘岚山在《我与山野书店》一文中,还无意间透露赵超构前来打牌找乐子的事。

1943年旧历新年过后,赵超构又来到“山野书店”,却发现店门紧闭,一种不祥之感漫上心头。他四处打探消息,终获知刘岚山已回重庆,暂住南岸郊区炼油厂,在南方印书馆担任助理编辑。他还未及与对方取得联系,就得到刘岚山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消息。

1946年,赵超构从重庆回上海创办《新民报》晚刊,某日突然从门外闯进一个蓬头垢面、灰溜溜的人,定睛一看正是刘岚山。原来当年他因牵涉出版进步书籍而入狱二年,出狱后曾赴解放区,后因家庭突发变故,便又辗转来到了人地不熟的上海。

赵超构见状,就让他留了下来。赵超构让他重操旧业做校对。当时编“夜光杯”副刊的,是在上海滩负有盛名的诗人袁水拍。校对也有分工,刘岚山除了新闻稿外,还负责副刊;帮忙计算稿费字数,偶尔也凑版面或补白——其实,他已参与了部分的编辑工作,因此与袁关系亲近,后来成为至交。袁

今天上海解放纪念日,同时也是复旦大学校庆纪念日。前几天,我作了一首小诗:学步邯郸梦犹在,风雨同舟六十载。此行重走人生路,脚云相辉共徘徊。这诗记录了5月3日一次情景交融的纪念活动,此举也是我们献给母校119年华诞的心香之瓣。

是日,正值“五一”劳动节放假之时,复旦园里游人如织,一路欢声笑语,朝气蓬勃,长者们为何要“轧闹猛”呢?我们这拨老复旦,1959年进校,五年制本科,



松风煮茗 竹雨谈诗 (书法)毛节民

水拍夫妇是苏州人,袁夫人做得一手好菜,赵超构与刘岚山偶或上门吃饭。三人喝酒吃菜,细饮慢啜,好不兴起。

1948年11月,赵超构、袁水拍等接受中共地下党的安排,先后“走避”香港。刘岚山临危接手“夜光杯”编务。据老报人张林岚说,此属于“私相授

受”,换言之就是“教一个校对暂时照看一下,每天发点稿子填满版面”。

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,刘岚山一直坚守在岗位上,“夜光杯”在他手中一天也没有停过。老报人张林岚曾专门著文,称赞他是“桅灯高举的留守者”。到了次年三月,国内及上海形势愈发吃紧。据夏晓虹教授回忆:“某日,父亲突然接到国民党党部部的通知,要夜光杯编辑前去开会。父亲本有左翼倾向,处此时局,更觉危险。经与朋友反复商量、研究,一致认为这很可能是个抓捕的圈套。于是父亲急忙脱身,转赴皖南游

击区。”

在上海《新民报》晚刊的三年,是刘岚山创作的“井喷期”。他发表了大量的诗歌、散文等文学作品,其中颇具影响的是《中国作家访问记》系列采访,先后介绍了郑振铎、魏金枝、叶圣陶、臧克家、穆木天、杨晦、姚雪垠、陈白尘、马思聪、许杰等名家。刘岚山兼职或专职担任“夜光杯”副刊编辑虽时间不长,却培养与发现了一批文学新人,著名的儿童文学家圣野——当时还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,发表的第一首诗就是经他手在“夜光杯”刊出的。

刘岚山与赵超构、袁

不悔今生

张广智

系上两位小朋友来迎。我特邀国伟当“导游”,他有满腹的校史轶事,满脑的趣闻故事,可以串成一部别样的复旦校史,有这样一位校史专家为我们讲解,幸矣。

我们在老教学楼(今为第一教学楼)前驻足。且把时空切换到59年秋,从三楼1239教室传来了宏音:“一个怪影(现译为‘幽灵’)在欧洲游荡——共产主义的怪影。”它穿越111年的时空隧道,在这座楼里飘荡,响彻东方……这个为历史系一年级学生新设的《马列主义基础课》,首篇就由袁维辉先生执教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《共产党宣言》,揭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,深深地蕴藏在59级学子的心坎里。

雨丝风片,烟波楼宇。1947年建造的登辉堂(今相辉堂)给我们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象。我们念书时,登辉堂是全校政治和文化中心,尤其是后者,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登辉堂每周要放两次电影,这是我们这一辈难忘的共同记忆。拍合影后,王鹤鸣和我、林仁川回忆当年三人一起参

加首次全国性考研。考试前夜,大雪纷飞,晨起偌大的校园,竟是一派北国风光,我们踏着三四寸厚的白雪,向设在考场的登辉堂漫步。考场甚冷,几盆炭火,根本无济于事,考生们埋头答题,哪还顾得上这些。这次考研全国统考,是一段多么刻骨铭心的青春印记。

漫步校园寻旧迹,六号楼前芳草萋。读史老张说,这楼可简单呀,留下了一届又一届的历史学子的足迹,现为任重书院的学生宿舍。一走进楼门,往左第一间,林仁川就像回到久别的家。他难抑激动:“我入学时就住在这个房间啊。而且,这间房与我同住的还有我三个高中同班同学。”在复旦历史系系史上,一个中学同一班级被我系录取4人,真是一则学林佳话。

夕阳西下,车子缓缓驶过正校门,大家向母校挥手告别。64届96位同学中,14人作为代表。时光荏苒,同窗五年,赋予我们的“复旦基因”;六十年走过的似水年华,铸就我们的“复旦精神”,永不消逝。重走当年在复旦学习生活过的地方,感慨万分,那一草一木似乎也在为59级点赞,那一砖一瓦亦为64届歌吟,正是:“不悔今生”情切切,春风常绿青春在!



读者·作者·编者

我们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却从来没有在校园里遇见过。工作之后,我们在上外的课堂里相识了。她说话细声细气喜欢穿长裙,笑的时候眉眼弯弯,还有两个酒窝。我的朋友,都是像我一样的性情中人,经常自以为清醒地剖析自我和对方,用“毒舌”伤害了对方却不自知,冷静了又觉得“诤友”可贵,彼此打击也相互取暖。她,却是另外一种存在,她是“正”,我是“邪”,她喜欢看我的平实的文字,我欣赏她的理想化和水一般的温和透明。

我们的职业道路大相径庭。她毕业之后进入一所几乎人人仰

望的名校,在那所在我看来学生、家长、教师都“卷”的地方耕耘多年。我,对于职业生涯只有一份浅尝辄止、知难而退的心意,可是对于把职业理想化、事业化的人们我有发自内心的敬意和羡慕。她,在那所学校里教着一门被冷落的副科,对于这门一般人觉得意义不大前景迷茫的学科,她全情投入,开发了自己和学生的全部潜能,用英文授课,修习第二外语,花三年时间研读了心理学方面的高级课程,设立了由她主导的工作室,成了挑剔的学生心中的“女神”。学生申请海外名校时找她这位副科老师写推荐信,她感到分外骄傲,开心得就像一个刚入行刚被认可的年轻教师。

我们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段爱上了心理学,她是为了“助人”,我却只是为了“助己”。她推荐我看的书,越来越高级,习惯了“风吹哪页看哪页”的我不得不跟着她小跑了一阵。

若干年后,女儿进入了理想的学校,承继了我的率性和有限范围内的桀骜不驯,一度让我陷入各种自责。我曾经以为,如果我是她,或许女儿能成为“别人的孩子”。那一个阶段,我们交流了很多,即便是她,也没能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理想中的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当我们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共同经历了一段磕磕巴巴的岁月,有心情重新审视自

己的时候,她建议我帮助她完成一个心理项目。第一次,我以“科学”的方式,在她和她的组员面前打开了内心。说实在话,我是不太相信那些心理治疗类游戏的。可是,那个周末的上午,一个沙盘游戏就令不习惯在别人面前流泪的我泪流满面。回家的路上,在开驶的路段居然开错了道,之后有一两个星期,我陷入一种神思恍惚的状态,仿佛被她施展了一个法术之后,醒了悟了。我不能确切地说,这一件事改变了我,但我得承认,这一次的疏导,让我重新认识了本来以为很了解自己的自己。

我总以为,以她把职业当作事业来追求的劲头,以及多年的勤劳耕耘,一定能达到理想的职业目标,又隐约觉得,这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世界。去年的某一个冬日,在被阳光洒满的玻璃茶室里,我,第一次成了她的倾听者。在一次又一次的她以为的众望所归中,她一次又一次地被出局。在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精力的大型活动中,她被多年敬仰的同僚加领导骂哭了。我安慰她,我们只对最亲近最信任的人发脾气,在单位也一样,我从来没有机会被大领导骂,除了握手。她失笑,但我能感到,她被伤到了。她的委屈和迷茫,让我心里有点小小的难受和释然。难受的是她的失意,释然的是,我们终于互换了角色。

第二天,我收到了她的微信,她说:谢谢你点醒了我,让我看到了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角落。

“不装,不作。”这是她对自己的认知。我心想,这是在说我吗?

“不装”与“不作”的世界多么简单,做这样的自己,有这样的朋友,又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。

在你的童年,有没有一个人给你“没原则的爱”?

生命中的光 责编:殷健灵

没有什么比《追忆似水年华》开头的那种句式,更能形容出我与公交车之间晃晃悠悠的情愫了。

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,我都是早早就上车了,有时候,窗外细雨,黏在车窗的水珠上,折射出都市绚烂的夜色。我就此盯着出神,都来不及嘟囔一声:‘到站了。’一会儿以后,我才发现自己被公车又带到了一片新奇的地方,这可能正是探索的开始。”

那会儿还是小学。我家从愚园路的老式石库门房子搬到古北路的新式公房。现在来看,也就是五六公里路程,但彼时却要换两部公交车。不论是20路换54路,还是44路换71路,总之,我频繁地通过这两部车往来于旧居与新居之间。

在好多个“大礼拜”——当时还没有双休日,而是一周休息一天,隔一周休息两天,我们把休息两天的那周叫作“大礼拜”——大礼拜那周,母亲通常要洗床单晒被子,早早地把我从床上赶起来,从家门口挑选一路公交车,挨个一站一站去探索。

直到今天,我仍然觉得71路是上海所有公交车中最有地位的一路车,这可能是由于,从外滩到古北串联起来的是上海这四五十年轻西行发展的变迁史,这样一段既令人人生畏又令人澎湃的路程,由71路细细途经,这怎么能不让人肃然起敬呢?而终点站正在家门口的54路又预示着另一番情绪的转变。它一路大多随着苏州河边,蜿蜒穿行,周家桥、三角场、中山公园、市三女中、

曹家渡、昌化路……写满了上海老区的烟火故事。

20路是我喜欢的,两根辫子,在愚园路上晃晃悠悠。梧桐婆娑,庭院深深,电车还没开到那段,心里就要溢出一丝丝缠绵的情愫。

人生要和哪一辆公交车结缘,往往是现实因素导致的,比如说,小学四年级开始,我住在古北路,学校却在汾阳路,那么96路就成了我记忆中不可抹去的一路车。

我通常喜欢坐54路到中山公园96路终点站去坐车,因为这样可以坐上座位。我喜欢挑选和驾驶员差不多并排的右边那个靠窗的座位坐下,因为那个位置比一般的座位更高一些,且前方没有视线阻挡,可以更好地观赏车窗外的风景。96路从中山公园开出来后,往武夷路左转,开入延安路往东行,江苏路右转至华山路左转,直到复兴西路,即一路往东行驶。春夏秋冬,来来往往,这条路线,成了小学生的我人生的第一条Citywalk路线:复兴路上莫测高深的深宅大院,丁香花园里的传奇故事、上海咖啡厂的前世今生、武夷路朴素街景背后的小洋房……毛拉的墙面、各式风格建筑的洋楼、分割着午后阳光的梧桐树影,还有安静却又喧闹的马路——这些画面,穿过长长的岁月,至今仍在我眼前展露着生动的色泽。96路似乎总开得

特别慢似的,却因此记录下少年生命里最值得纪念的漫步和等待。

时隔30年,我最爱坐的依然是96路,最爱走的依然是这一段路,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喜爱,成为了一名都市历史文化爱好者、从业者。

再说两路记忆深刻的公交车吧。

一路是101路。当时有一次和一位素未谋面的“笔友”见面,但却想不出约在哪里见面才好。不知道是谁,灵机一动说,我们看看地图,挑选一部路线最长开到最远的公交车,我们从终点站坐到终点站,一路聊天看风景,岂不妙哉?于是整个下午,我们坐了一圈又一圈,20多年过去了,至今我们仍然是知心好友。

还有一路是21路。1995年是我21路的“蜜月期”。在这之前,我的生活半径向北没有跨过苏州河。但那一年,众所周知,申花足球队在虹口体育场拿到了甲A联赛冠军,而正是21路,把西区的我第一次带到了市北的虹口区,带到了申花队夺冠的那个辉煌时刻。那时候,每一场申花比赛结束后,大约有成百上千神魂颠倒兴奋不已或沮丧不堪的年轻人坐着21路回顾着这一个夜晚,哦,还有一半人去坐18路了。大家不分彼此,车子一离开,一路聊:“哦,成都路到了,我先下去了,下次球场见哦!”还有几次,有些人聊得太投缘,到站了也不下去:“没关系,我陪你坐到中山公园,我再掉头坐回来!”售票员忍不住提醒——“末班车来!”

